

北京大学地質地理系 編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

侯仁之 主編

科學出版社



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

侯仁之 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62

內 容 簡 介

本书第一次把地理学在我国古代——从原始公社至封建社会末期——的发展，作了簡要而系統地敘述，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也显示了历史时期我国地理学上的一些巨大成就。

本书不但是地理工作者和大学地理系学生应该閱讀的书籍，同时也可供历史工作者和一般文化工作者参考。

中国 古代 地理 学 簡 史

編著者 侯 仁 之 主 編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 朝 阳 門 大 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总經售 新 华 书 店

1962 年 7 月 第 一 版

书号：2550

1962 年 7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字数：106,000

精：1—1,750

开本：787×1092 1/16

(京) 平：1—2,050

印张：5 1/2 插頁：7

定价： 精装本 2.10 元
平装本 1.50 元

序 言

中国古代地理学簡史的写作,是在1958年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和全民大跃进的鼓舞下开始的。这年八月,北京大学地質地理系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不顧自己学識的浅陋,力量的单薄,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在很短的时间內,集中力量,写成了古代部分的初稿。現在把这部初稿整理出版,以便得到更多同志的批評和帮助,指出我們的缺点和錯誤,提供我們修正的原則和意見,使我們能够集中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丰富它、改进它,这是我們最殷切的希望。

我們决心写这部书,不是由于我們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已經有了全面而独到的研究,而是由于客观上的迫切需要。到現在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可以适合当前要求的地理学史,尤其缺乏有关古代部分的写作。一般地理工作者以及大学地理系的师生,很需要了解过去我国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很需要認識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我国的历史悠久,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和自然界进行着斗争:开辟了这样广大的土地,改变了这样复杂的大地面貌,利用了这样众多的物产资源,从而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創造,并且获得了光輝灿烂的成就。在这一情况下,如果說我国地理学沒有获得什么发展,显然是完全錯誤的。

毛主席很早就指示我們說:“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創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将古代封建統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現时的新政治新經濟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經濟发展而来,中国現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給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辯証法的发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羣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們向前看。”¹⁾在这里,毛主席不但指示我們整理古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而且还明白告訴我們應該遵循的原則和道路。这一指示,对历史工作者固然是重要的,对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人,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地理学范圍內,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本門科学发展的系統研究,虽然作得还很少,但是在全民大跃进的鼓舞下,我們再不能安于这种現狀,决心立刻去改变它。我們所能作到的,仅仅是从无到有,初步整理了一个系統,以求闡述地理学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在內容上的处理,我們力求选择典型、删除繁枝,希望作到簡明扼要,并为进

1) “新民主主义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頁679。

11028.65

一步的探討奠定基礎。但是由於我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學習和應用得還很不够，業務水平也很有限，因此書中的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還需要廣大讀者批評指教。

在這裡，應該補充說明的有兩點。

第一，我們選擇了“山經”、“禹貢”和“地員”三篇作為我國地理學最古的代表作，其中“山經”成書年代最早，“禹貢”次之，“地員”更次之。如果“山經”是奴隸社會末期寫成的，那麼“禹貢”和“地員”的成書，已經是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但是為了敘述方便，這才合為一節，放在第一章的末尾。

第二，我國古代地理學，到了明末清初，也就是公元十六、十七世紀，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這時一些先進人物，在地理學的研究上，突破了舊日的桎梏，開拓了有目的地探討自然和所謂“經世致用”的新方向。他們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如徐宏祖（霞客）、顧炎武（亭林）也都是習慣於長途旅行的人。霞客半生踟躕於山野間，他熱愛祖國山河，縱筆描寫，盡情歌頌，其所以不朽，則在於他逐步深入去探索自然的規律，揭發自然的奧秘。至於亭林，則正如恩格斯論述歐洲十六世紀的先趨者的特徵時所說的那樣是在“時代運動中和實際鬥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¹⁾他關心的是郡國利弊，十分重視實地考察。把豐富的地理知識作為他政治鬥爭的工具。但是最能明白說出這一時代地理學發展的要求，並向舊傳統、舊觀念進行了果敢的衝擊的，是劉猷廷（繼莊），他說：“方輿之書所記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聞也。”²⁾所謂“天地之故”就是指著對於自然規律的探討。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明確賦予地理學以新的內容，指示出進一步發展的新方向。但是繼莊一生，對舊的破壞有餘，對新的開創未足，建立新說，體大而思未精，他自己於此也深有所感，在他提出了自己編寫地方志的意見之後，跟著說道：“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³⁾同時代的孫蘭（柳庭）雖然也曾在新發展的方向上作過一些努力，但是也沒有作出更大的成績。為什麼到了明末清初，在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上，竟會出現這樣一個時期？這不是偶然的，脫離了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樣一個時期的出現，將是不可理解的。最根本的原因，應該認為是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促使中國封建社會面臨著最後的階段，而這樣的新思想、新學風的興起，是和整個社會經濟的新因素相適應的。同樣的，當我們看到這一地理學上的新發展竟然是後繼無人的時候，也必須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具體過程中去尋找最根本的解答，這一點正是我們企圖將來在中國地理學史的近代部分中所要說明的。

全書的編寫，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前四節由侯仁之（北京大學）執筆，第三章由徐兆奎（北京大學）執筆；第四章的第五節由曹婉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執筆。至於全書的結構和絕大部分的內容，則是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中國地理學史”一課的

1)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曹葆華等譯，人民出版社，1955年，頁5。

2) “廣陽雜記”，中華書局，1957年，頁150。

3) “廣陽雜記”，頁151。

讲义作为基础的。初稿完成之后,在编写小组的全体成员和两个单位的有关同志中都进行了讨论并作了若干修改。

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鼓励和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陈原副局长都曾抽暇阅读全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这更是我们铭感难忘的。自然这部书中还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对于各种理应采纳的意见也难免有理解不足或力所不及的地方,这些统由编者负责。至于有关全书体例的意见,一时难于大改,只好留作继续修订的参考。

侯仁之

1960年1月 写

1961年8月改作

目 录

序 言	(iii)
第一章 原始公社和奴隶社会时期的地理学	(1)
第一节 原始公社时期地理知識的萌芽	(1)
第二节 奴隶社会时期地理知識的发展	(2)
第三节 我国最古的地理著作	(5)
(一) “山經”与“禹貢”	(5)
(二) “管子”中“地員”篇的地理价值	(9)
第二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秦至唐)	(12)
第一节 中央集权封建統一国家的建立及地理学的发展(秦、汉)	(12)
(一) “貨殖列传”——古代經濟地理描述的代表作	(12)
(二) “夜书”中的“地理志”——疆域地理志的創例	(14)
(三) 域外地理知識的扩展——张騫通西域	(16)
第二节 封建統一国家分裂时期地理学上的一些成績(三国至南北朝)	(18)
(一) 制图学的成就——裴秀的“制图六体”	(18)
(二) 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酈道元的“水經注”	(19)
(三) 法显的旅行及其“佛国記”	(21)
第三节 封建統一国家的再建及其地理学(隋、唐)	(24)
(一) 地志的发展与全国总地志的代表作——“元和郡县志”	(25)
(二) 賈耽及其“海內华夷图”	(26)
(三) 玄奘“大唐西域記”的地理价值	(27)
第三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宋、元)	(31)
第一节 宋代封建社会經濟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地理学	(31)
(一) 沈括对自然地理現象的觀察	(32)
(二) 地志的进一步发展与规范化	(35)
(三) 沿革地理的发展	(37)
第二节 元代的地理学	(38)
(一) 东西方地理知識的交流	(39)
(二) 河源的实地考察	(43)
第三节 宋元輿图	(45)
第四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明至鴉片战争)	(48)
第一节 郑和的远航	(49)
第二节 西洋制图学的輸入与清初全国地图的測繪	(52)

第三节 反映于水利事业中的地理学·····	(55)
(一)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所反映的地理知识·····	(56)
(二) 在与黄河斗争中有关自然地理知识的发展·····	(56)
(三) 从“畿辅水利”的讨论中所看到的一些改造自然的理想·····	(59)
第四节 时代先进的地理学家·····	(62)
(一) 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在自然地理学研究上所开辟的新方向·····	(62)
(二) 把地理研究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	(67)
(三) 刘继庄的地理思想，兼论顾祖禹和孙兰·····	(70)
第五节 封建社会末期地理古籍的整理·····	(78)

第一章 原始公社和奴隶社会时期的地理学

第一节 原始公社时期地理知識的萌芽

根据远古的传说和地下的发掘,可以知道在我国从旧石器时代以后,也就是从原始人类在体质形态上逐渐失去残余的猿的性质以后,曾经进入了一个长期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制度的社会¹⁾。这个原始公社制度到了传说中的夏朝,开始解体,逐渐向奴隶制度的国家过渡。

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那时生产力非常薄弱,人类借以生活的工具,仅仅是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时期地理知識最初的萌芽。

地理知識的萌芽是随着生产斗争的发展而俱来的。这种生产斗争从最初起就和一定范围的地区有关,尼科尔斯基(В. К. Никольский)在其“原始社会史”中这样写道:“所有制的最古的形态,只能是公社的,而绝对不是私有财产制。这种由科学所仅知道的最早的所有制形态——羣人(最初是因血缘关系较近而联系)对生产手段、首先是对土地的公社所有制,是从原始人羣在一定的食料地区共同进行初步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原始人羣的流浪式的生活,决不能想象为是处于经常迁徙状态,而无任何地域范围的限制的”²⁾。从此可以设想,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畜牧和农业的萌芽,又从一个地区的停留生活相对的定居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他们不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等,还必须知道气候的特征以及地方的种植的可能性;他们不但要能够辨别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就在这时期,原始的居民点开始出现,有的且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例如晋南西阴村的史前遗址,就达到了东西 560 米和南北 800 米的面积,这和现在的一个小村落比较,不相上下。可以说明人们在这里已经过着相当稳固的定居生活,农业已经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畜牧同样也在向前发展³⁾。西阴村遗址所代表的叫做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较高的一种文化,距离现代约有四、五千年,它分布的地区,考古学者认为是传说中黄帝族文化的遗址。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修订本。

2) 庞龙译,作家书店,1953年再版本,页 61。

3)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页 29—30。

仰韶文化遺址的發現，不但說明農業和畜牧業在生產部門中已經占着重要地位，而手工業特別是陶器的製造也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¹⁾。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貨物的交換關係在當時已經存在，古代有農氏“日中為市”的傳說；可能是若干鄰近定居的部落之間，已有貨物交換的行為。但是後來這種貨物交換的發展，不僅限於鄰近部落之間，而且擴展到遙遠的地區。例如在甘肅的遺址中，就有磨制的玉片、玉瑗和海貝的發現，這些都不是當地的產品，來自何處還難確定；貝則一定來自沿海地區。由此可知當時在廣大的範圍內已經有了交換關係。這種交換關係，必然是間接進行的，即使如此，也會引起人們對於遠方的想像和探詢的欲望。

因此我們說，在原始公社時期，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說明當時地理知識的萌芽，但從人類生產發展的過程來看，這一時期的人們不但了解他們居住的地區，而且隨着生產的發展和貨物交換的產生，也獲得了一些有關鄰近部落甚至於遙遠地方的傳聞。但是這一時期人類的地理知識，畢竟還是處於萌芽的階段，他們不但沒有文字，連語言也很簡單，地理知識難於積累，更難形成任何系統的概念。同時，在他們看來，周圍的自然界還是充滿了神秘和恐怖的，從而產生了自然崇拜，使自然現象變成了各種各樣的神，只有在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前提下，人類地理知識的萌芽才有可能冲破原始雲霧的籠罩，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節 奴隸社會時期地理知識的發展

原始公社在傳說中的夏朝逐漸解体，歷史學家認為夏朝世襲制度的剝始，就是原始公社制度開始破壞的象徵²⁾。這時私有制逐漸確立，奴隸主與奴隸兩個階級逐漸在擴大。隨後興起於東方的商(殷)，生產力比夏更進步，終以武力滅夏，建立起一個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國家。但這還並不是說原始公社制度已經完全消滅，它還有很大部分的殘余繼續存在。繼起的周朝，因為發明並使用鐵器於農業生產，促使農業的急劇發展，力量強大起來，終於滅商，最後完成了奴隸社會³⁾。

商周時代，奴隸的勞動產生了古代燦爛的文化，原始地理知識的萌芽也是在這一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積累和發展。

從商朝起已經有了文字的發明，周朝以後文字的記載日益增多。憑着文字的記載，可以更好地探討這一時期地理知識發展的情況。而文字本身在後來也正是地理知識積累和傳播的重要工具。

商朝手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種類也很多，這時已進入青銅時代，不但是玉器和骨器製造已很精細，就是銅器的製造也達到了高度的藝術水平。生活所需的皮革、釀酒、舟車、

1) 在仰韶文化遺址中，豐富的陶器和陶片，普遍存在，其中有的陶器製造技術和紋飾，都相當精美。有的遺址中還發現紡輪，所有的遺址中都有骨針和骨錐，足見紡織和縫紉已是一種普遍的工業了。

2)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二章第一節，人民出版社，1953年修訂本。

3)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頁12—16。

土木营造、飼蚕、織帛、制裘、縫紉等，也都見于甲骨文。手工业的发展，必然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地理知識的传布不但成为經常的，而且成为必要的了。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就使人們更多的認識了自然，因而逐漸摆脱了对自然現象的神秘感。卜辞中虽有祭祀高山大川的文字，但它与原始公社时代之对牛鬼蛇神(图腾)都要崇拜，已有所不同¹⁾，相反地这說明在分辨高山大川而进行祭祀的时候，就反映了人类地理知識已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随着奴隶制度国家的建立，領土的观念逐渐明确，这时已經按照地域来区分其統治下的人民。根据卜辞，殷商全盛时期，其政治势力所及，包括有現今河南全境以及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其周围有属国环绕。卜辞又有土方(国名)征我东鄙，鬼方牧我西鄙等記載，“鄙”也就是边境的意思²⁾。因此也就有所謂“西大史”、“北御史”等守卫国境的武职³⁾，由于国家的出現必然促进了統治階級对于地理知識要求的增長，以便对内进行有效的統治和剝削，对外出兵征討，守卫边疆。

最初有系統的地理知識，有很大可能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图来表示的。“詩經”的“周頌”有“墮山乔嶽，允犹翕河”的詩句，郑玄箋注解“犹”为图，他說这是按照图上所指示的山川来依次祭祀的意思。如果他的說法不錯，那么这可說是很早的有关地图的記載了。但無論如何，地图的出現是很早的，它一方面用来表示系統化了的地理知識，另一方面为了一定的目的也可以随时制作地图，这里可以举一个有名的例子来作說明，这就是“尚書”的“洛誥”所記周公卜建洛陽城的故事，原文是这样写的：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东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东，亦惟洛食。俾來以图及獻卜。”

这里所說的“俾來以图”的“图”，肯定的是地图，而且是为了选建洛陽城址而特別繪制的地图。根据这一段記載再加上另外的“召誥”和“多士”两篇⁴⁾，可以知道周朝初年成王在丰京即位之后，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远在东方所征服的領土，和进一步鎮压还在企图叛变的殷商奴隶主，决定在洛河流域修建一个新城。为此先派召公作了初步的地理考察，随后又派周公选定城址，进行建造。周公到了現場，进行占卜。他先卜黃河以北黎水之上(今河南濬县东北)沒有結果。又卜澗水以东灋水以西的地方，結果城址应在洛水边上。再卜灋水以东，也是应在洛水边上。于是占卜完了，使者把图和占卜的結果一齐獻給了成王。根据这次占卜的結果，果真建筑了两座城，居于澗水之东灋水之西的，叫做王城，居于灋水之东的叫做成周。王城是一个統治的中心，成周等于是有一个“集中营”，把不服周朝統治的殷商大小奴隶主一齐迁到这里，以便監視⁵⁾。根据这段記載，不但說明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經

1)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頁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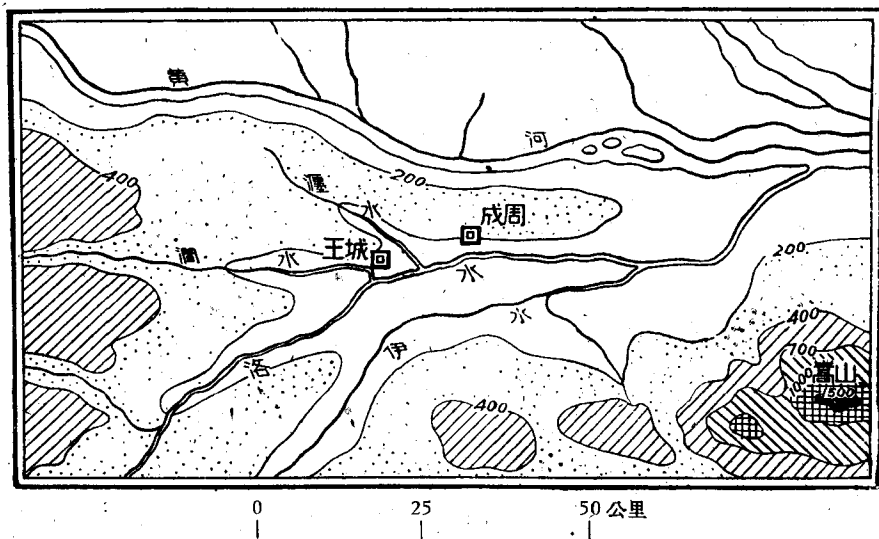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簡編”第一編第二章第五节，人民出版社，1953年修訂本。

3) 同1)，頁83。

4) “召誥”的一开头是这样写的：“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5) “多士”篇：“成周既成，迁殷頑民。”

有了地图，而且还告訴我們在解决实际問題上已經利用了地图。地图較之文字能够更有效的表示一个地方的地理特点，它是地理学特有的語言。



图一 王城成周位置略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理知識的积累日益丰富，地图的制作和使用也日益增多，这对国家的統治者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是國家管理上需要使用地图，另一方面在战争用兵上更是需要地图，这里我們虽然缺乏直接的文献足資証明，但是从一些比較晚些的記載里，也可以得到印証，例如“周礼”地官司徒有如下的一段記載說：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輪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这里不但提到設有保管地图的专官，而且講到了地图的用处和它的主要内容，图中不仅显示了地域的广袤，而且表明了地形的高下、山林川泽的分布等等，这已經是系統的地理知識的具体表現了。

又如关于軍实用图，“管子”一书的“地图”篇，也有十分精采的描写：

“凡兵主者，必先申知地图，輾轅之险，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草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軍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象这样的地图，地物的表示，更加完备，内容也更加复杂，恐怕不是单靠符号所能說明的，还可能附有文字的注释。总之，沒有翔实的地理知識，或缺乏实地的調查，是制作不出这样的地图来的。

“周礼”大約是战国时代的著作，“託古”于周公之世，但所說“天下土地之图”一定有相当的历史根据，而不是出于完全虛构。“管子”一书虽然不是管仲自己所写，但也是出于战国人的手笔，必然有当时的事实作根据，不能一意夸张。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地

图既然已经达到上述的程度,这就应该看作是战国以前,奴隶社会时期地理知识长期发展的结果。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能反映我国古代地理知识发展水平的文献,还不是地图,而是地理著作,下节特别举出“山经”、“禹贡”和“管子”的“地员”作为代表,分别加以讨论。

第三节 我国最古的地理著作

(一) “山经”与“禹贡”

“山经”也叫做“五藏山经”,是有名的“山海经”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¹⁾。

“山经”和“禹贡”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先后写成的²⁾,这一时代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从生产工具方面看,春秋后期铁制的生产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上已被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发展,牛耕、灌溉、施肥、粪种等提高生产的措施,也在不断推广,特别是战国时期在关中地区与成都附近都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出现。在南方的江、淮、太湖、汉水流域,北方的漳、淄、济等水以及鸿沟一带也都有不少灌溉系统的建设。这一时期,劳动人民开垦了大量的土地,农业生产已经走上了比较集约经营的道路。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已经有了很细的分工,原料使用的种类也日益繁多,这就必然促进了对于自然资源的探寻和开发。其中冶铁一项,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已经成为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由于生产的发展,商业也繁盛起来,出现了很多通都大邑。同时,交通,特别是水路运输,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时疆土日益开拓,各地各族的接触也愈趋频繁。因之地理视野就空前地开扩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发达,货币的流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于是土地所有制起了变化,旧日贵族领主的统治逐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所代替,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了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愈见强大,尤其是西方的秦国,首先建立起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进而企图兼并他国。这时广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割据战争中受尽了痛苦,也渴望统一与和平,因之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逐渐形成。

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上,“山经”与“禹贡”的作者,先后开始从全国范围来进行复杂的地理上的描述。“山经”更多地承袭着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多少带有一种结集的性质,而“禹贡”则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启示下,概括的叙述了全国各地区的地理特点以及山岳河流的分布概况,并进而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理想,以地理著述为手段,突出的反映了这一时期具有先进意义的大一统思想。这两部书不但是我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地理著

1) “山海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山经”或称“五藏山经”,共五卷六篇;第二部分为“海经”,共八卷八篇;第三部分为“大荒经”,并附“海内经”一卷,共五卷五篇。

2) 两书年代争论很多,此从顾颉刚说,见“五藏山经试探”(北京大学晋社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

作,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的文献里,也占有重要地位。

山 經

“山經”的作者所面临的第一个問題,就是如何才能把广大范围的地理知識,进行系統的叙述。材料十分丰富,內容也很广泛,究竟应该从哪里着手呢?这是前人从来沒有人作过的事,是自古以来的一种創举。

現在分析全部“山經”的結構,可以知道“山經”作者以今山西省西南隅和河南省西部作为“中山經”的主要部分,自此以南为“南山經”,以西为“西山經”,以北为“北山經”,以东为“东山經”。这五个部分,就是五个地区,每个地区之内,作者以山岭为綱,分列次第,如“中山經”又分“中次二經”,“中次三經”,一直到“中次十二經”等。从头至尾按照一定方向和道里依次加以描述。“中山經”次第分为十二經,“西山經”“东山經”各分为四經,“南山經”“北山經”各分为三經。“中山經”的主要部分范围虽小,而叙述最詳,可能是因为这一带地方的生产比較发达,地理知識的积累比較丰富。至于叙述的方向,“南山經”主要是自西而东,“西山經”与之相反;“北山經”主要是自南而北,“东山經”与之相反。至于“中山經”則或东或西,并不一致。总之,全书以山为綱,方向与道里,互为經緯,有条不紊。茲以“中山經”为例,可以摘录其叙述綱領如下: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
又东二十里曰历儿之山,
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
又东三十五里曰葱牟之山,
又东十五里曰倭山,
又东七十里曰脫履之山,
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
又东七十里曰泰威之山,
又东十五里曰檀谷之山,
又东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
又北三十五里曰阴山,
又东北四百里曰鼓鑿之山,

最后总結一句說:“凡薄山之首,自甘枣之山至於鼓鑿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¹⁾。以下又讲祭山之礼,可以不論。

綱領既张,然后再把有关的地理知識附丽上去,所記有水,水必言其发源与流向;有动物、植物,动植物每詳述其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有矿物特产,矿物特产也常記其产状、色泽等特点。此外也記有各地的传说和神話。这些都是最多描述的对象,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就上文所举的“中山經”的叙述綱領为例,甘枣之山,所記事实如下:

1) 所記总里数原文有誤——編著者。

“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¹⁾，其上多柎木，其下有草焉，莠本而杏叶，黄华而莢实，名曰籐，可以已瞽。有兽焉，其状如猓鼠而文，其名曰鼯，食之已瘰。”

蔥聋之山和淩山，都記有矿产說：

“蔥聋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璽、黑青黃璽。”“淩山，其上多赤銅，其阴多鉄。”

至于传说神話，也可从“中山經”中举出一个例子来作說明：

“中次三經，……青要之山，实維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墀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纍蒲卢。魍(神)武罗(神名)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而穿耳以鑿，其鳴如鳴玉。”

除此而外，經文中还有一些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关自然地理現象的描写²⁾，例如关于华山的險峻地形写道：

“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鳥兽莫居。”(“西山經”之首)

关于河流的季节变化也写道：

“敦山，……敦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干而夏流，实惟乾河。”(北次三經)

又有的地方記載了山上冬夏有雪³⁾，山下河水潛流⁴⁾，井泉夏有水而冬竭，或冬有水而夏竭的現象⁵⁾，也記載了动物的“冬死而夏生”⁶⁾，或“冬見夏蟄”⁷⁾，这些都應該是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結果，为数不多，却可珍貴。

最后，还应该着重指出，全书所記矿产，十分丰富，只就所記金属产地来計算，就有一百七十多处，其中提到的有金、黄金、赤金、白金、銀、赤銀、銅、赤銅、青銅、美銅、鉄、錫、赤錫等共十数种，尽管矿产名称的含义并不都十分确切，但其种类之多是明显的。如果把所記述的全部矿产，包括各种岩石計算在內，那么当时已經能够辨別和認識的，至少也有七、八十种，这就充分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情况和生产上的迫切要求。为此，后人在全书的末尾加了一段总结說：

“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鉄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鋸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得失之数，皆在此內，是謂国用。”⁸⁾

这几句話，点破了“山經”的一个主要意义，那就是“山經”的主要内容，本是来自生产斗争的实践，沒有生产斗争的实践，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多的知識，而这些知識，也还应该用到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去。有人說“山經”是巫医之书，那只能說是片面的看法，是不能概括它的全部意义的。

1) 河即黄河。

2) 参考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学史集刊，第一期，科学出版社，1958年。

3) “北山經”之首“小咸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

4) “北次二經”：“白沙之山，……鑿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5) “中次五經”：“超山，其阳有井，冬有水而夏竭”，“中次十一經”：“視山，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南次三經”：“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

6) “南山經”。

7) “西山經”。

8) 这一段附見今本“山經”之末，毕沅以为是周秦人解釋的話，誤入經文(“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以为是校书者据旧語所加。

总之，“山經”作为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地理书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可以看作是我們的祖先自古以来在生产斗争中所获得的全部地理知识的一个总结。尽管其中包括了許多类似荒誕不經离奇古怪的事，但并不因此就失去它的全部价值。过去有人把它和后出的“海內經”、“海外經”与“大荒經”（合称“山海經”）一概摺之于小說异聞之类，是很不應該的。

禹 貢

“禹貢”的成书較“山經”为迟，同时，作为一种地理著作来看，其价值也在“山經”之上。这不是因为它叙述詳細，相反的正是因为它用了极其簡洁的文字，十分概括地讲述了当时已知的中国地理上的重要事实。“山經”全书二万一千多字，而“禹貢”全篇还不到一千二百字（一千一百九十三字）。“山經”主要是罗列事实，“禹貢”則已經从紛然併陈的地理现象中，抓住了最基本最關鍵的东西，并提升为一种概念，用簡洁明确的文字表达了出来。从结构來說，“禹貢”的作者，已經完全放弃了以方向与道里互为經緯的那种外表上的和形式上的处理方法，而开始采取了有内在联系同时又有明显差异的区域对比的記述，作者首先把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名之为九州。他假託九州是大禹所划分的政治疆界，实际上是以天然的山、河与海来作为划界的主要标志。

叙述从冀州开始，依次是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每州分叙其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及田賦等級、貢品名目，最后还有水陆运输綫。在有关的州里，还講到了少数民族。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区分各州的土壤，并用統一的标准来比較各州的田与賦的等級。在九州的排列（冀州为首）与田賦等級以及貢品运道的叙述中，都充分反映了大一統的思想，但其中也有从自然情况上来进行区域間的比較的，例如在講到兗州的植物被复时，他的描写是：“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到了徐州境内，已是“草木漸包”，来到南方的揚州就成为“厥草惟夭，厥木惟乔”的景象了。兗州位在济、河之間，正当現在的华北平原。徐州是今泰山以南、淮河以北，东至于海的地方，正当魯南、苏北与皖北的平原。揚州則是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与其三角洲一带。这三个地区自北而南，都是平坦地带，“禹貢”作者在描写其植被情况时，北边兗州的草木抽发为长条，有些疏朗的景象；自此而南的徐州，草木逐渐丛茂，复盖大地；到了南方的揚州，則是草极繁盛，树极高大的林莽之区了。这就儼然描繪出了自黄、淮下游以至长江三角洲自然景观逐渐变化的一幅图画，暗示了一种地带性的变迁，也可以說是有关地理景观的最早的描述。

在九州叙述之后，就是称为“导山”和“导水”的两部分。

“导山”部分，专論山嶽，作者已經掌握了九州以內山嶽分布的形势，其特点是：第一，西高而东低；第二，西部集中而东部分散。因此，这就决定了作者叙述的順序，他自西而东，先从渭水以北的山岳講起，始于岍、岐（皆在今陝西省渭河北岸），中經壶口、雷首（陝、晉之間）、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晉南）、太行、恆山而至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境），自雷首以下都是在黄河的左岸。其次，又从渭水南岸的西傾、朱圉、烏鼠和太华（隴陝）开始，中經熊耳、外方、桐柏（豫西）而至陪尾（魯南），这些都在黄河之南。第三，始于嶓冢（陝南），中

經荆山、内方而至大别(以上均在鄂、皖),都在汉水右岸。第四,从岷山(川)起,远經衡山(湘),而至敷浅原(赣北)。作者列举这些山岳,假託大禹治水时“随山刊木”所經行的路綫,因此只举名目,未作描述。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黄河的中下游以及汉、淮之間山岭的分布可以說已經得其概要。至于长江流域的情况,就显然有些模糊了。他这种逐条列举的方式,暗示了山脉的含义,后人加以解释,有所謂“三条四列”的說法¹⁾,就有很多附会的成分了。

“导水”部分,叙述也极有条理,先后次序,井然不紊。因为是假託大禹治水,故先从上游开始,首先讲到最西方的弱水和黑水。其次,在中原、黄河为害最大,故次讲河。第三,河以南汉与江为最大,所以又讲到汉与江。第四,河以南,江汉以北,只有济、淮二水独流入海,所以江汉之后再讲济、淮。最后是渭、洛及其支流,因为渭洛两水又都是黄河的支流²⁾。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先北后南,先上后下,先主流后支流的排列原則,也反映了对“九州”之内,河流水系的分布概况,已是一目了然,所差的只是对于远在西方的弱水和黑水,有些难于捉摸了。

“禹貢”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所謂“五服”的部分,现实的地理意义最为薄弱,但是恰好在这里,却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目的。他所向往的是政治上的統一,是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文化的宣揚与广布。因此,他以一种理想化了的中央行政制度,来传播他的大一統思想。从地理事实看来,这一部分好象最无价值,但是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一部分却是很重要的。总之,作者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才写出了这篇地理著作的。而这一政治目的——大一統思想的宣揚和传播,在当时來說是具有先进意义的。

(二) “管子”中“地員”篇的地理价值

如果說“山經”和“禹貢”主要的都是区域地理性质的写作,那么“管子”一书的“地員”篇,則代表了地理学发展的另一个方向的萌芽,这个方向在今天完全确立,这就是部門地理学。“管子”一书中,包含了一些很值得重視的地理学的思想和概念,“地員”可以說是其典型的一篇。

“地員”主要是根据实地观察的結果,来探討土地与植物相互关联的規律性,既具有地理学的价值,也具有植物学的价值,夏緯瑛称之为我国最古的有关生态地植物学的論著,是不为过誉的³⁾。

“地員”前半,分別讲到平原、丘陵和山地三种不同地带的土地与植物生长的关系。首先叙述大平原上五种土壤的宜生谷种,宜生草木,水泉深浅。其次叙述丘陵地的高下等

1) 汉朝儒家以岷(岐至碣石为北条,西傾至陪崑为中条,岷山至敷浅原为南条。或以嶓冢至大别为中条分支,共成四列。

2) 崔东壁:“考信录”。

3) 夏緯瑛:“管子地員篇校释”,中华书局,1958年。在該书序言中,校释者从現代的科学知識出发,跳出过去学者专从文字訓詁方面去解释“地員”篇的窠臼,而从实际內容上去深刻地研究了这篇有科学价值的古代文献。本节取材于此。